

Fanyi Fojing Yuliao Yanjiu

翻译佛经语料研究

颜洽茂 等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Fanyi Fojing Yuliao Yanjiu

翻译佛经语料研究

颜洽茂 等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佛经语料研究 / 颜洽茂等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9. 4

ISBN 978-7-308-19006-0

I. ①翻… II. ①颜… III. ①佛经—汉语—翻译—研究 IV. ①B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44072 号

翻译佛经语料研究

颜洽茂 等著

责任编辑 胡畔(lpp_lp@163.com)

责任校对 宋旭华

封面设计 春天书装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版 杭州隆盛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高腾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37.5

字数 765 千

版印次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308-19006-0

定 价 8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s.tmall.com>

本课题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资助（项目号 05JJD740012）

本书出版受浙江大学董氏文史哲研究奖励基金和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资助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一)研究动机	(1)
(二)研究内容与方法	(8)
(三)佛经翻译成果	(10)
第二章 翻译佛经语料的性质与特点	(18)
(一)翻译佛经语料的性质	(18)
(二)翻译佛经语料的特点	(26)
(三)语料的价值取向	(58)
第三章 翻译佛经语料的研究价值	(68)
(一)汉语史研究价值	(68)
(二)文献学研究价值	(80)
(三)辞书编纂学研究价值	(85)
(四)翻译佛经语料的局限性	(98)
第四章 翻译佛经语料的分期	(101)
(一)从佛教史角度对翻译佛经的分期	(103)
(二)佛经翻译事业之演进	(106)
(三)从汉语史角度对翻译佛经的分期	(140)
第五章 翻译佛经语料的分类	(148)
(一)汉文大藏经分类沿革	(148)
(二)翻译佛经内容与形式分类	(176)
(三)从汉语史研究角度对翻译佛经的分类	(208)

第六章 翻译佛经语料的文例(上)	(217)
(一)翻译佛经的篇章结构	(219)
(二)翻译佛经的套语	(246)
第七章 翻译佛经语料的文例(下)	(293)
(三)翻译佛经的用字之例	(293)
(四)翻译佛经的用词之例	(312)
第八章 翻译佛经语料文献的整理	(373)
(一)翻译佛经语料文献整理的必要性	(373)
(二)翻译佛经语料使用中的几个问题	(380)
(三)翻译佛经语料整理的内容	(385)
(四)翻译佛经语料鉴别方法	(415)
(五)译经语料鉴别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432)
第九章 翻译佛经语料研究释例	(444)
(一)《昙无德羯磨》译经年代考辨	(444)
(二)《撰集百缘经》翻译地点综合考辨	(459)
(三)《五阴譬喻经》译人综合考辨	(472)
(四)《菩萨本缘经》撰集者和译者综合考辨	(488)
第十章 翻译佛经语料库的构建与应用	(500)
(一)语料库的分类、特点和汉语语料库的建设	(500)
(二)翻译佛经语料库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511)
(三)翻译佛经语料库的规划与建设	(520)
(四)翻译佛经语料库与语言研究	(535)
参考文献	(545)
一、古籍之部	(545)
二、工具书	(548)
三、今人之著	(548)
四、学位论文	(554)
五、期刊论文(含论文集)	(556)
附录	(565)
附录1 大乘六大部经重译本情况一览表	(565)
附录2 东晋南北朝时期的异译经	(570)
附录3 已作语言学考察的失译、误题之经	(571)
附录4 失译待质经律论目录	(574)

附录 5 核心语料目录	(577)
附录 6 辅助语料目录	(590)
索 引	(594)
后 记	(595)

第一章 绪 论

梁启超先生谓：“佛教为外来之学，其托命在翻译，自然之数也。自晚汉迄中唐，凡七百年间，赓续盛弘斯业。宋元以降，则补苴而已。”^①绵延千余年的佛经翻译事业，给我们留下了卷帙浩繁的汉译佛典语料，它不仅是中国文化领域的瑰宝，也是世界佛教史料的珍品。

(一) 研究动机

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符号系统，它是表达交流的中介，认知的工具，文化的载体。

罗杰瑞曾经指出：“世界上很少有语言像汉语那样含义广泛。……当你要指的是某个时期的汉语时，这就会产生某种的不便，假如要避免歧义，你就得使用某种复杂的名称——古汉语、文言、中古汉语、早期白话……。”^②

这些名称关涉汉语史研究中的很多问题。

重建汉语史必须要有正确的史学观。

其一，“古汉语”是一个通行但又宽泛的概念。“如果求名实相副，所指应该是‘古代汉民族的语言’。这几个字牵涉的问题很多，因为‘古代’的下限难定（上限只能到有文献可考），‘汉民族’的内容太杂（尤其商周时代）。 ”^③通行的观点，汉语以五四为断限划分古代和现代，“古汉语”这个概念囊括了先秦至清末长达四千年的汉语历史。严格地说，“汉语”由汉族得名^④，其前身为“华夏语”，汉代以后各个时段，无论是语音、词汇、语法，都有不同的面貌。然而事实上，“直到不久以前，还是

① 《佛典之翻译》，《佛学研究十八篇》，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83页。

② [美]罗杰瑞：《汉语概说》，语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③ 张中行：《文言和白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页。

④ 汉族则由汉朝得名，参见王力《汉语史稿》绪论，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页。

有许多人把‘古代汉语’当作一个单纯的东西来对待”^①。索绪尔强调了语言的共时研究(主要指当代)和历时研究的区别,因而具有深远影响,但遗憾的是他没有指出(或者说强调)历时研究是由若干共时断面研究作为基础的;故从研究的角度来说,“汉语”应划分出远古、上古、中古、近代、现代等几个阶段,而不是混沌一块。

其二,按照王力先生的观点,“古代汉语是一个比较广泛的概念,大致说来它有两个系统:一个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言以及后来历代作家仿古的作品中的语言,也就是通常所谓的文言;一个是唐宋以来以北方话为基础而形成的古白话”^②。这段话从今天来看,要作一点修正:首先,根据语言的传播媒介功能,书面语和口语才是“两种可选择的‘平等的’语言表达系统”^③,而“文言”和“古白话”仅仅是汉语古代书面语的两个系统。其次,根据最新的研究,“周代和周代以前所遗留下来的书面语,秦代至汉初的某些书面语,大致是和当时口语相近或相一致的,汉初以后,各时代文人的书面语仿照前人的词汇、语法用法和行文格调,成为一种脱离当时口语的‘特殊书面语’”^④,这就是“文言”,而“从汉末魏晋以后到‘五四’前(权作这样划分),还有一种与口语基本一致的书面语,这就称为古白话”^⑤。因此,古白话语体,应该始自汉魏而成熟于唐五代。

其三,王力先生认为,“我们学习和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前者,即上古的文学语言以及历代模仿它的典范作品”^⑥,而从汉语史研究来说,两者都不可偏废,某种意义上,后者(与文言相对而并存的,反映东汉至五四历代口语成分的白话)更显重要。

在语言研究历史上,人们对书面语和口语关系的看法有很大的分歧,事实上,书面语和口语并不“平等”,它们的物质形式有差别:“口语使用‘语音实体’,呈典型的空气压力运动形式;书面语使用‘图文’实体,为典型的表面标记的形式”^⑦。

历史上曾经流行书面语至上论,“几百年来,书面语一直占据首位。它是文学的工具,因此也是判断语言优劣的标准根据。人们认为书面语使语言具有永久性和权威性”^⑧。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书面语能反复阅读并经得起推敲,能表达更为紧凑、复杂的结构;书面语为避免依赖语境而了解意思,往往更仔细、最大限度减少模糊和歧义;书面语的“图文特征”(表格、图形、公式、标点、色彩)具有口语没有的图文效果;书面语的语法、词汇更为精密;书面语比口语更正式,受法律约束

① 吕叔湘:《语言和语言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② 王力:《古代汉语》校订重排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页。

③ 参[英]戴维·克里斯特尔:《剑桥语言百科全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页。

④ 许威汉:《汉语白话发展史叙》,《汉语白话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⑤ 许威汉:《汉语白话发展史叙》,《汉语白话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⑥ 指文言——抄者注,王力《古代汉语》校订重排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页。

⑦ [英]戴维·克里斯特尔:《剑桥语言百科全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页。

⑧ [英]戴维·克里斯特尔:《剑桥语言百科全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82页。

的协议,如合同,通常要求用书面形式来书写。^①我们还可以以汉语为例。前面已经说过,语言不仅仅是认知的工具、表达的中介,更是文化的载体。为什么“中国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显然对口语不感兴趣”,“是因为从公元前 3000 年一直延续至今的深厚的中国文化统一体,即使在过去政治分裂的时期,那种文化上一统的单一帝国理想,从没被忘却过。汉语,特别是它的书面语,一直是这个文化统一体的最有力的标志。由于汉字不反映不同时期、不同方言的具体读音,使人感到汉语是统一的、不变的,这就更便于汉语作为政治、文化统一的标志。而过去各朝各代一直使用的书面语言即文言文,变化也极小,这更加强了汉语是统一的、不变的这种看法”。^②

当然,也出现过“口语至上论”。为什么 20 世纪世界语言学研究偏向于话语分析?是因为口语至上论者认为“口语比书面语早好几千年;小孩的口语是自然发展的(而书面语却需要人工教授);而且文字系统是衍生的——大部分是以口语的音为基础的”^③,所以美国语言学家伦纳德·布隆菲尔德(1887—1949)坚持认为,“书面语不是语言”,“而仅仅是用能看得见的符号来记录语言的方式”。既然“口语是书面语的根本”^④,是世界上所有民族交际的最主要的工具(事实上,世界上很多民族没有书面语),它理所当然应该成为语言研究的主要对象。但是,当我们研究语言的历史时,“口语至上论”便遇到了挑战。在语言声学建立和录音技术发明之前,口语无法保存,我们无从听到古人的口语。

客观地说,文言、白话和口语,同属一种语言,而不是分属不同的语言。“三者都是传达文化的手段,并不能和社会上不同阶级的文化画等号。但实际上它们还是反映了中国各阶级文化思想上不同的强调方面。如果把读者画成三个同心圆,那么文言文学的读者群就是最中间的那个最小的圆圈,包围在它外面的那个较大的圆圈里是白话文学的读者群,最外面那个大得多的圆圈,则是口头文学的听众群。”^⑤因此,我们研究古代某个时段的语言时,不能不借助反映历代口语成分的有关文献,并以现代方言加以印证。这也是白话文献日益受到重视的原因。

重建汉语史要有扎实的材料基础。

历史语言学的语料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方言和亲属语言的材料,这是现在的活材料;另一类是文字、文献的材料,这是反映历史发展状况的死材料。^⑥翻译佛经属于后一类。

① 参《剑桥语言百科全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84 页。

② [美]罗杰瑞:《汉语概说》,语文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 页。

③ [英]戴维·克里斯特尔:《剑桥语言百科全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83 页。

④ 吕叔湘:《语言和语言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 页。

⑤ [美]P. 韩南:《中国白话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2 页。

⑥ 参徐通锵《历史语言学》,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版,第 4 页。

研究中古的语言,必然要用中古的语料;要想在中古汉语研究中取得突破,一是要有先进科学的方法,二是要有可靠的语料。但是“中古时期是资料使用方面特别困难的时期。一方面经典的各种注释、史书、佛教道教的经典、诗文的别集等广泛急剧地增加;另一方面,这些资料被后世改动的也很多。如果问纯粹的六朝时期的资料是什么,一下子还不好回答”^①。

理想的语料当然要充分反映各个时期口语的状况,但流传下来的历史资料中,纯粹代表某个时期口语的资料几乎没有,“在没有录音设备的时代,有声语言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想保存,就不能不靠长寿的书面语言”^②,这也就是古白话材料日益受到重视的原因。

罗杰瑞认为,研究早期白话(或者说反映口语程度高的文献)的资料主要有三种:

1. 宗教文献。“传教士,由其工作性质所决定,在传教时都尽量用简单的、易于被人接受的语言来说明教义。所以,早在东汉时期,佛教文献(几乎包括所有的翻译,和对印度原文的解释)就具有强烈的白话味儿。这种白话性质,延续了几个世纪,直到宋代都是这样。”^③

2. “流行的诗歌和短篇故事的集子也是研究早期白话的重要资料。”^④

3. “保存有直接对话的文字段落,是研究早期白话的第三种重要资料,这种对话的记载,可以在列朝的正史实录、逸事趣闻及流行的传说故事中见到。”^⑤

徐时仪则认为:“列代记载当时实际语言而反映汉语白话发展的文献资料主要有以下作品:

(1)用口语体写的文学作品,如敦煌曲子词、敦煌变文、宋元话本、金元时的诸宫调、元杂剧、明清白话小说等。

(2)为某种特定需要而记载下来的当时口语的实录,如禅宗语录、理学家语录、外交谈判记录、司法文书、直讲体、会话书等。

(3)散见于文言作品中的白话资料,如诗、词、曲中反映口语的语句或笔记史传和碑帖中反映口语的片断。”^⑥

罗氏列举,着眼于文献“反映口语程度高”这一点上,长处是特标“宗教文献”,缺点是没有点明具体的文献资料。

徐氏所列,着眼于“较能反映当时口语面貌的古白话作品”,如“口语体写的文

① [日]志村良志:《中国中世语法史研究》,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88页。

② 张中行:《文言与白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③ [美]罗杰瑞:《汉语概说》,语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页。

④ [美]罗杰瑞:《汉语概说》,语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页。

⑤ [美]罗杰瑞:《汉语概说》,语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页。

⑥ 《汉语白话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页。

学作品”“口语的实录”，并补充“散见于文言作品中的白话资料”，而且还特标“语录”，指向明确，问题是“择要略作介绍”^①的项目与分类不甚匹配。如“汉译佛典”，由于“既非纯粹口语又非一般文言”，归不进上述三类；“宋儒语录”也是“文白混杂的半口语化的语言”，严格地说，也不能算“记载下来的当时口语的实录”；“诗、词、散曲”并不对应于“(3)散见于文言作品中……反映口语的语句……”，汉乐府诗和北朝民歌本来就“来自民间”，而列代流传的民歌“本来就属口语的记录”；“散文”当为古代概念，指与韵文、骈文相区别的散体文章，包括说理散文和历史散文，但把“公文法典”和“碑帖”包括在内又无形中扩大了范围，与后面几类形成交叉；“方言”单独为一类似无必要（例举不是活材料），所举例中《秋胡戏妻》《梧桐雨》属于前列的“五 戏曲”，《儒林外史》《歧路灯》属于“八 小说”；“其他”中，“文集”与前“六 散文”交叉，“宝卷”可归入“五 戏曲”，“书信”则与前“六 散文”中“碑帖”相孱杂。

但两者异曲同工的是，罗氏将“宗教文献”列为第一，而徐氏择要列举介绍中将“汉译佛典”放在第一，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翻译佛经无疑是中古时期的重要语料。但是，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翻译佛经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盖因为前人在研究资料上，以先秦两汉文言典籍及后世仿古写成的典籍为“正宗”，而将一大批比较接近当时语言实际的材料，例如诗词曲、笔记小说、语录、诏令、奏状、民谣、道书、碑文，特别是翻译佛经的材料列为末流，排斥在采摭征引之列；其次，翻译佛经本身是一个非常庞杂复杂的体系，疑伪经卷杂出（道安《综理众经目录》设《疑经录》，列 26 部 30 卷；僧佑《出三藏记集》列道安所出疑经，并撰《新集疑经伪撰杂录》，列疑经 12 部 13 卷、伪经 8 部 13 卷；法经《众经目录》卷二著录疑伪经 197 部；彦琮《众经目录》卷四录疑伪经 209 部 491 卷；智升《开元释教录》则列疑伪经 406 部 1074 卷），经中俗字异体横行，一些语词艰涩难懂，一般人不敢轻易涉足。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梁启超、吕叔湘、周一良的倡导下，特别是七八十年代李维琦、张联荣、朱庆之、蔡镜浩、董琨、俞理明、方一新、梁晓虹、曹广顺等一批语言研究者克服种种困难和偏见，重新审视、考量翻译佛经的语料价值，并且把它们作为中古汉语的研究对象，才使翻译佛经语料受到广泛的关注。

翻译佛经卷帙浩繁，数量众多，既有一定的时间跨度，也有一定的空间跨度；既有佛学专用词语，也有汉语日常用语；既有某些书面语的语体特征，又颇具口语性。因此，翻译佛经语料在时间轴、空间轴、学科轴、语体轴四个维度上都有较大的覆盖性，是中古时期不可多得的语言材料。正因为这样，在汉语史研究中，翻译佛经语料日益受到重视。在文字、音韵、训诂、词汇、语法等研究领域，均可看到翻译佛经语料的使用，而且还出现了一些以翻译佛经语言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论著。

① 《汉语白话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9—49 页。

前辈学者对翻译佛经的语料价值,特别是“喻俗”的价值有着清醒的认识。如吕叔湘先生说:“宗教是以群众为对象的,所以佛经的文字也包含较多的口语成分。”^①业师蒋礼鸿先生也指出:“所谓‘中古汉语’和前汉以上的‘上古汉语’有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它的语汇的口语化。这个口语化的现象表现在汉译佛经……方面。”^②

柳士镇《魏晋南北朝历史语法》、董志翘《中古虚词语法例释》、方一新《东汉魏晋南北朝史书词语笺释》、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都涉及翻译佛经语料的分类、时代问题,方一新《翻译佛经语料年代的语言学考察》^③还从新词、新义、词语用法及俗字等角度分析验证了失译的《大方便佛报恩经》(七卷)的确切年代。

蓝吉富《佛教史料学》^④是一部综合介绍佛教文献的著作,主要介绍印度、日本、中国等的佛教史料,其中涉及翻译佛经译本、译义、译音以及疑伪佛典与经录的应用等问题。

但总体上来说,目前尚缺乏对翻译佛经语料全面、深入的研究,鲜见以翻译佛经语料为题的专书或专文研究。同时,在对话语料的认识和利用等方面,还存在着诸多不足,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对佛经语料的性质、特点、地位等问题的认识仍不够深入。比如,翻译佛经语料到底算是中土语料还是一种“佛教混合汉语”(朱庆之,2009)?除了口语性、宗教性这些特点之外,翻译佛经语料还有哪些特点?作为“后时语料”的翻译佛经语料,利用时存在着哪些局限?翻译佛经的文体对词汇语法有哪些影响?跟中土文献相比,语料的地位究竟如何?……这些问题尚需深入探讨。

其二,对翻译佛经语料仍缺乏全面、系统的文献整理。尽管我们已有《中华大藏经》《新修大正大藏经》可以使用,但跟其他中土文献相比,我们的校勘、整理工作仍显不足。翻译佛经版本众多、异译屡见,再加上不明时代的疑伪经卷杂出,有些经卷显然难以直接利用,需要做大量的版本考订、文字校勘等工作,才能做到去伪存真、去粗存精,爬梳出全面真实地反映语言实际、时代面貌的材料。以早期的四大译家现存译本为例,仅吕澂先生便订正出63部81卷误录之经,其他失译、疑伪的经卷更不在少数。因此,对翻译佛经语料的文献学研究仍必不可少。

其三,翻译佛经语料在汉语词汇史和汉语语法史等研究领域应用较多,如李维琦、张联荣、朱庆之、蔡镜浩、方一新等人在中古词汇研究方面广泛应用翻译佛经语料,而董琨、柳士镇、唐钰明、曹广顺则大量利用翻译佛经语料进行语法研究,但在汉语史其他研究领域使用较少,存在着严重的失衡现象。作为中古时期颇具代表

① 《语文常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81页。

② 《〈中古汉语词语例释〉序》,《杭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

③ 《古汉语研究》2003年第3期。

④ 台湾东大图书公司,第1997页。

性的语料,其价值远远不限于为考释词汇提供书证或印证某种语法现象,它在文字、音韵、训诂、语义、语法、词典编纂等诸多方面的价值需要全面认识、多方论证、系统发掘,其应用领域仍需大力拓展。

其四,翻译佛经语料的利用存在着简单化、随意化现象。电子文本的问世使语料的检索变得更便利、更简单,但在翻译佛经语料的使用过程中,“同时语料”和“后时语料”的鉴定、核心语料与辅助语料的论证、口语语料和书语语料的区别、语料的利用原则、语料的使用方法等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仍需作进一步探讨。

其五,对翻译佛经语料缺乏一种在现代语料库语言学视角下的观照。高小方《中国语言文字学史料学》(1998)是以汉语史语料为研究对象的专著,但由于研究的侧重点不同,高著更像是“语料索引”;在对语料认识上,仍是传统的文献学视角。陈海波撰文探讨了“数据库”在古汉语研究中的应用问题^①,已经涉及语料库建设的若干问题。但总的来说,在研究目的、研究观念、研究方法等方面仍是传统的。若借助现代的语料库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借助于计算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我们将会取得新的突破。比如,词汇的历时考察一向是个难题,但若借助语料库,对文本的流通度、词汇的使用度等加以统计分析,也许会取得新的成果。目前,尚未见到把语料库语言学和翻译佛经语料结合起来的成果。

以上就是本书的研究起因。

本书将通过翻译佛经语料的研究和利用为汉语史研究作一些基础性工作。

本书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在于:

1. 全面审视、考量翻译佛经语料的性质、特点,对翻译佛经语料在汉语史研究中的地位、作用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2. 通过分析、鉴别和整理,为汉语史研究特别是中古汉语研究提供可信的、翔实的翻译佛经语料。

3. 为断代语料研究提供一些“模型”,探索断代语料研究的规律和方法。翻译佛经语料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本书将深入研讨翻译佛经语料的鉴定方法、分类标准、利用原则等问题,从而为研究词汇史、语法史、语音史等提供有价值的借鉴材料。

4. 为汉语史语料库的建设进行理论和实践上的初步探索。近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电子文本的普及,国内已经开发出不同加工深度的现代汉语语料库 20 余个,而古代汉语方面的语料库(例如由厦门大学负责开发的“《全唐诗》《全宋词》语料库”)则凤毛麟角,并往往存在着标注(annotation)简单、开发深度欠缺等不足之处,真正符合汉语史专业研究人员需要的语料库则几乎没有。语料库的工具主要有转写工具(transcriber)、检索工具(concordancer)、对齐工具(aligner)和其

① 《关于数据库在古汉语研究中的应用》,《古汉语研究》2000 年第 3 期。

他统计工具等;对汉语史研究而言,符合研究者需要的翻译佛经语料库工具应具备检索和统计这两个基本功能。如何开发出符合研究者需要的汉语史语料库和面向翻译佛经语料的语料库工具,其中面临着许多理论和实际问题。本书将充分吸取台湾同仁在佛经语料数字化建设方面的经验,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5. 探索现代语料库语言学和计算语言学视角下的汉语史研究的新思路和新方法。目前,语料库语言学和计算语言学取得了不少成果,利用这些成果,将会使汉语史研究取得新的突破。例如,利用历时语料库对语言进行研究时,就可以采用先进的检索、标注工具对一些词汇和语法演变现象进行大规模计量统计,从而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李维琦在《佛经释词》和《佛经续释词》中、汪维辉在《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中都曾利用电子文本检索研究词汇,初步显示了检索工具的威力。而台湾中华电子佛典协会承办,菩提文教基金会、西莲教育基金会主办,中华佛学研究所、法鼓佛教学院协办的“CBETA 电子佛典集成”将大正藏、已续藏、嘉兴藏、正史佛教资料类编、藏外佛教文献、北朝石刻拓片电子化,实在是一件“功德无量”、有益于学林的大好事。随着电子检索工具进行汉语史研究的广泛应用,探索现代语料库语言学和计算语言学视角下的汉语史研究的新思路和新方法必将成为当务之急。

(二) 研究内容与方法

本书以翻译佛经为主要研究对象,从汉语史、文献学和语料库语言学等角度对翻译佛经语料进行研究,其目标是对翻译佛经语料进行全面清理,包括翻译佛经语料的鉴定、分期、分类等,从而为汉语史研究提供翔实可靠、方便易用的语言材料,为汉语史语料库的建设提供“模型”,为汉语史大规模语料库建设提供“子库”,并探索汉语史研究和古汉语语料研究的新方法。本书将包括以下基本内容:

1. 对翻译佛经语料的性质、特点和地位进行深入研究。力求概括翻译佛经语料的特点,探讨翻译佛经语料的性质,论证翻译佛经语料的地位。初步研究结果显示,翻译佛经语料具有架构系统、内容广博、版本众多、语词俗化、语言混合等特点;而从语料的价值取向上来看,翻译佛经语料则具备真实性、具体性的特点,即译人及译经地点明确,有一定的数量和时间跨度,版本比较可靠。因此,翻译佛经语料在汉语史、宗教史乃至中外交流史上都有重要的地位,本书将充分肯定翻译佛经语料在汉语史研究中的地位。

2. 从历时角度考察翻译佛经语料的分期断代问题。根据对佛经翻译史的初步研究,翻译佛经可以再分为东汉译经、魏晋译经、南北朝译经、隋唐译经、宋元译经等几个阶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翻译佛经的数量、汉化程度、语体风格等都有所不同,认识、分析这种差异有助于我们对翻译佛经语料进行汉语史意义上的分期断代,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语言特点。

3. 从共时角度考察翻译佛经语料的分类问题。由于翻译佛经的内容、文体、修辞以及译者的文化水平、译经的地区等都可能对翻译佛经的语言有所影响,对翻译佛经语料进行分类并归纳其特点显得尤为重要。从内容上看,有些翻译佛经讲述佛本生故事,叙事性较强,其语料价值也较高;有些翻译佛经则论说佛教经义,内容抽象,用语晦涩,其语料价值也会打折扣;有些翻译佛经记录佛教戒律,其语料特点是口语性较强;从文体上看,翻译佛经中一般有散文和偈颂,而句式也有独字、二字以至七字等式,总体上呈现散诗兼行、华梵交错、文白结合的语言风格和色彩,这种语体特征和修辞特点也必然会对翻译佛经的使用产生影响。

4. 探索、归纳翻译佛经语料的文例原则。翻译佛经作为一种特殊的文体,其文例必然异于中土其他文体,通过与中土文献及其文体的比较,总结归纳翻译佛经语料的文例原则,将有助于汉语史研究。翻译佛经语料中,狭义的“文例”包括用字之例、用词之例、连用之例、同素逆序之例等等,归纳这些文例原则也可用于语料库标注;而广义的“文例”,则包括用语(例如套语)、篇章结构等方面的特点与规律。

5. 研究并阐述翻译佛经语料的汉语史、文献学价值。分析论述汉译佛经语料在文字、语音、词汇、语法、辞书编纂、文献考订等各方面的重要价值。

6. 翻译佛经语料库的构建和应用的设想。语料库的建设不只是文本的数字化,还包括语料的调查、分析、标注,语料工具软件的开发和研制,语料库的维护、升级和利用等大量工作。本书拟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对上述问题进行探索,提出初步建立基本符合研究者需要的翻译佛经语料库的一些建议和设想。目前,我国语料库建设的主要特征是描述性研究呈现强势,缺乏解释和应用层面的进一步探索。与语言研究相比,语料库技术开发研究薄弱,构建语料库的理论研究仍需加强。

本书研究的重点将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翻译佛经语料的分期和分类、翻译佛经语料的文例原则、翻译佛经语料的文献整理原则与方法、翻译佛经语料库构建和工具开发的设想。

本书拟求在以下几个方面获得突破:

翻译佛经语料的分期和分类问题。本书将根据语言特点、文体风格、语料价值等原则对翻译佛经语料进行分类,对“中古”翻译佛经语料进行分期,以彰显翻译佛经语料在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的语言特点,给汉语史研究提供一份明晰的翻译佛经语料清单。

失译、疑伪翻译佛经的年代鉴定问题。本书将采用文献学和语言学方法对一些年代不明的失译、疑伪译经进行考订,以确定其年代;即便不能完全确定其年代,也将根据其语言特点对其语料价值重新进行估量。

翻译佛经语料库构建的理论探讨和语料库工具开发的设想。语料库不仅是工具,也是一种理论架构,通过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才能创新语言研究的路子。本书将力图完善汉语语料库语言学理论构架,并为汉语史大规模语料库提

供真实有效的样本。

本书的难点问题主要有：

首先，由于翻译佛经数量宏大，佛教典籍汗牛充栋，翻译佛经的情况又十分复杂，疑伪译经杂出，所以本书的工作量巨大。

其次，语料库语言学在我国还是个新兴学科，许多理论和方法仍处在引进、消化阶段，有待于进一步完善；而把语料库语言学、汉语史研究与文献学研究结合起来更是一种全新的尝试。此外，语料库工具的开发需要跨学科的研究，最理想的知识结构搭配是“具备计算机知识的语言学家”。因此，本书将面临许多困难，像研究资料匮乏、研究基础薄弱、人员协调等问题，是对研究人员新的挑战。

从研究方法上来说，本书力求把传统文献学与现代语言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传统文献学是本书的基础，现代语言学则是新的视角，二者结合的共同指归是为汉语史研究服务。

本书将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一方面以计算、统计等定量方法为相关理论提供翔实、可靠的支撑；另一方面则充分利用理论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来弥补定量方法的不足。

本书将把文字叙述和图表说明结合起来。通过相关数据的收集和分析，把有关数据统计以图表的形式展现出来，以便于历时、共时等各种角度的比照。

本书既重视具体的文献整理，也重视理论的阐发与规律的总结，把现象描写和理论解释结合起来。例如，本书将在对疑伪经卷考订的基础上，对一些规律性的方法加以总结。

本书致力于研究方法的创新，既有历时上各个时期语料的比较，也有共时层面不同种类语料的比较，还包括翻译佛经内部不同文体语料的比较，力求在比较中彰显语料特点，总结语料规律。总之，努力使方法缜密科学，结论信实可靠。

（三）佛经翻译成果

自后汉始，佛经翻译事业绵延千余年，“此真我国民一大事业也”！诚如梁启超先生所言：“……翻译事业进化之迹，历历可寻：以译本论，初时多凭胡僧暗诵传译，后则必求梵本；同是原本也，初时仅译小品，后乃广译大经；同是大经也，初时章节割裂，各自单行，后乃通译全文，首尾完具。以译人论，初时不过西域流寓诸僧，与不甚著名之信士，后则皆本国西行求法之鸿哲，与印土东渡之大师。以译法论，前此多一人传语，一人笔受，后则主译之人，必梵汉两通，而口译、笔受、证义、勘文，一字一句，皆经四五人之手乃着为定本。以译事规模论，初则私人一二，相约对译，后乃由国家大建译场，广罗才俊。以宗派论，初则小乘，后则大乘。以书籍种类论，初